

现代化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具备了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内在条件，比如自主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以及普及基础教育引入开明精神等。但是以中国为首的亚非世界却过于拘泥于传统，导致了欧化政策的失败和现代化进程的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缺乏近现代现代化所要求的各种内在和主体性的条件。因此亚非世界被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个原因在于，日本人由于拥有片面强调“一国自律性发展论”的历史观，所以将日本自己定位于历史的“主体”，同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世界（东方）定位于历史的“客体”的倾向就颇为强烈。

只要抱定西方近现代文明引导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观，这个主体化、客体化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将西方定位于主体，将东方定位于客体。结果大部分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将自己作为主体，将中国看作客体，不加疑问地把自己置于优越地位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并不断强化这种倾向。

第三个原因在于，研究主体将自己置于研究客体之优越地位，说明其思想根源中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发挥着作用。这种情况下，就象科学实验室那样，研究者的认识与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有意识性的行为在方法论上被割断了。即使没有完全割断也是极端微弱的，因此产生了可以忽视客体影响的方法论上的“歪曲”。

上述方法论的“歪曲就表现在现代中国学中出现的各种东方主义现象。当然这种东方主义是中日两国间的“共同主观性”的“歪曲”，因此并不只有日本人处于这种歧视构造中，成为客体的中国人同样也身处其中。正如沟口雄三所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了对抗西方现代化而走上了某种意义的“反现代”道路，其自身就包含中国与东方主义中的歧视构造纠缠在一起的寓意。正是这种对东方主义的诅咒，才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⁴²

总而言之，大多数日本人“不看”、“没看到”日本战后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个现实（共同主观性），这种状况正是主体与客体被有意识

地割裂的产物。

更进一步说，日本的中国学者将自己置于研究对象中国之上，根据自己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尝试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构的同时，却无视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反向作用，这种方法论当然免不了只去评价对其判断有利的研究对象的倾向。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对研究对象的因果分析发生混同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由此研究的“客观性”就会受到怀疑。如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中割断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意志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共同主观性”一直在进行着双向互动和变化。对于这种目的意志，如果依据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优越地位为前提的方法论，就会造成忽视主客体之间“共同主观性”的双向变化的结果。

(5) 目的论的排他性与现代中国学的“客观性”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目的论在研究者或研究团体之间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产生对立和冲突。过去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中出现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的对立就是一例。

目的论上的分歧如果发展到互不妥协的地步，一般，会形成学术性的学派团体，以在内部加强为本派的目的论进行辩护的意识，但是，即使在因果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在修正本派的目的论上有所发现，也很有可能忽视甚至无视这种发现，容易产生为了适应目的论而进行因果分析，即将目的论与因果论相混同的弊端。

过去，抱有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立场相近的目的论的研究者，与批判日本追随美国、维持对华“战争状态”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亲华”、“反华”这两种极具排他性立场的对立情况。在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亚洲政经学会和现代中国学会之间的不同立场即为一例。⁴³

前者为了将日本追随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予以正当化，倾向于认可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种目的论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揭露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推动革命外交后中国内政外交的失败和阴暗

面,结果在毛泽东去世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客观性”得到了肯定。与此相反,后者对战争中日本的侵略抱有浓重的忏悔之意,从批判战后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立场出发,很多情况下倾向于拥护甚至赞美中国。对于文化大革命和革命外交等事后被证明是显而易见失败的内外政策,也始终对其阴暗面视而不见,予以赞美。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缺乏“客观性”的研究受到了严厉批判,甚至还出现了进行自我批判的研究者。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上述两者的中国研究都产生了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目的论中强烈的排他性使得这种混同成为必然,其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也被曲解了。

上述目的论与因果论混同造成的“价值中立性”丧失的情况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中曾经更为典型地出现过。具体而言从1965年末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的大约10年间,包括研究机关、大学在内的中国国内的学术活动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

文革期间学术活动取消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围绕被称为政权内部路线斗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论所展开的激烈斗争殃及到了学术世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的对立原本与学术上目的论的对立是不同次元的问题,因为在政治路线对立中,方法论并不被要求具有“实证性”。尽管如此学术研究必定会有一些的目的,这种目的在现实政治中参与文化、经济和政治改革等政策时,就会与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比如50年代前期以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样本改革中国经济为目的开展的部分研究,在1959年中苏对立激化后,其目的论即遭受严厉批判,研究本身也遭到了压制。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拉开序幕之后,在政府的政策目的与学术研究的目的论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再次出现上述情况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至今不允许公开研究文化大革命,这可能是由于担心文革研究者的目的论会导致对文革进行重新评价,由此可能产生的学术对立和论战有妨碍政府推行政策的危险。⁴⁴

不仅在中国,在今天的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特别是小泉执政以后,从学者中网罗“有识之士”进行决策的倾向愈发明显,学术界的目的论与政府的政策目的盘根错节的程度更强,从科研经费的申请拨付开始,政府的研究资助与政策目的在各个方面都更加紧密地结合。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如何自觉地认识这种现状,将是今后不可忽视的课题。

(6) 20世纪90年代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976年9月,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紧接着10月份文革后期始终渴望获得权力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粹,文革的真实惨状也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结果日本的中国学界中一向全面肯定、礼赞文革和毛泽东的亲中国派学者受到了集中攻击,他们的研究被指责为歪曲事实。

当时尽管还没有在方法论上形成自觉认识,但主流看法是,亲中国派进行的文革礼赞性的研究所犯的错误在于,其研究带有政治意图性的价值(观)判断。其后的现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尽可能地多搜集信赖度高的信息资料,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客观”分析。⁴⁵

但是到了90年代,日中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日本的部分中国研究者表现了参与中国的决策和社会改革的意向。这种带有社会改革实践性质的研究当然就包含目的性价值判断。可问题在于,在对文革末期的中国礼赞论进行批判之后,90年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形成了必须从研究中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的难以自拔的成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现实的中国研究已经包含了目的性价值判断,仍不可能自觉地形成自身的目的论,难以保证在方法论上克服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

更有问题的是,90年代以后日中学术交流的活跃并不是在日本学术界的主导下实现的,而是被先行一步的中美学术交流的发展所刺激,具有很强的他律性。中美间学术交流的发展是以下述两点变化为契机实现的。